

扬雄从才子型文人到学者型文人的转化及其意义

侯文学

(吉林大学 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扬雄的经历与转折对于汉代文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扬雄居蜀 ,入京初为待诏、郎官 ,入石室观书 ,构成他人生的三个阶段。他的创作也以此为脉 ,分为三个阶段 ,初期受蜀地地域文化影响 ,作品逞才使气 ,自娱娱人;中期亦是逞才 ,但开始受朝廷士大夫文化及经学话语的影响 ,兼有讽喻倾向;后期作品引经据典 ,为现实政治服务 ,兼自娱。因为职务之便 ,他博览群书,《剧秦美新》《州箴》《官箴》等作品援取经典之语 ,为东汉文人作了很好的示范。扬雄的出处选择为后世文人提供了较好的参照。

关键词: 扬雄;才子型文人;学者型文人;转化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579(2015) 05 - 0077 - 08

On YANG Xiong' s Change From Wit - literati to Scholar - literati and Its Significance

HOU Wenxue

(School of Humaniti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 YANG Xiong' s experience and transition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in the Han Dynasty. YANG Xiong' s life was divided three stages: living in Shu area ,being a Daizhao and Lang officer in the capital ,reading books in the stone house. His works ,taking it as a clue ,were also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His early works showed his self - consciousness with the feature of amusing himself and other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ichuan region; his middle works showed his self - consciousness and the allegorical tendency affected by the scholar - bureaucrat culture; his later works served politics and amused himself by quoting classic languages. YANG Xiong' s source choice provided a good reference for later literati. He referred to the classical languages in *Ju Qin Mei Xin* ,*Zhou Zhen* ,*Guan Zhen* ,and made a good demonstration for literati in the Eastern Han.

Key words: YANG Xiong; wit - literati; scholar - literati; change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古代文人 ,按照他们作品中呈现出的“才”与“学”的比例划分 ,大致可以分为才子型文人与学者型文人两类。当然 ,这也只是大致的勾勒 ,落实到具体作家身上 ,情况远为复杂。就总的历史趋势而

收稿日期: 2015 - 03 - 2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汉代文化与都邑文化”(编号: 11YJC751030); 吉林大学青年学术领袖培养计划项目“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之关系”(编号: 2012FRLX05); 吉林大学前沿与交叉学科项目“汉代城市与汉赋”(编号: 2012QY003)

作者简介: 侯文学(1972 -) 女 ,吉林德惠人 ,文学博士 ,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

言,当社会稳定发展持续较长时间之后,文人的知识积累日益丰厚,就会出现一批学者型文人,从而和前期的才子型文人形成对照。这主要受文学自身发展规律——求异求新思想的支配。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要文类,后代超越前代,必在学问上着力。比如就诗歌的发展而言,中唐韩愈的诗歌对于李杜之诗的超越,宋诗对于唐诗的超越,往往被概括为“学者之诗”(或曰“文人之诗”)对“诗人之诗”(或曰“风人之诗”)的取代,前者“以书为本,以事为料”,后者以情为主,“以鸟兽草木为料”。^{[1](卷八)}时代不同,形成这一走向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

对于汉代文学的历时性特征,刘勰曾经反复论及,结论大体一致,如“自卿、渊以前,多俊才而不课学;(扬)雄、(刘)向以后,颇引书以助文。”(《文心雕龙·才略》)“夫经典沈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扬(雄)、班(固)以下,莫不取资。任力耕耨,纵意渔猎。操刀能割,必裂膏腴。是以将贍才力,务在博见。”(《事类》)又:“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惟贾谊《服鸟赋》,始用鶡冠之说;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书,此万分之一会也。及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至于崔、班、张、蔡,遂摭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事类》)在刘勰看来,汉代文学以西汉后期作为分界,此前作家创作主要是逞才,是才子型文人;此后作家往往以学助文,表现为学者型文人。扬雄是分界点上的重要作家。刘勰的判断比较准确地勾勒出两汉文学的整体走向。

刘勰举以为例的扬雄《百官箴》引书助文的倾向非常明显,如著作权没有争议的《大司农箴》几乎是撮《书》、《诗》之语而成:

时维大农,爰司金谷。自京徂荒,粒民是斛。肇自厥初,实施惟食。厥僚后稷、有无迁易。实均实赢,惟都作程。旁施衣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阅三王。什一而征,为民作常。远近贡篚,百则不忘。帝王之盛,实在农殖。季周烂熳,而东作不敕。膏腴不获,庶物并荒。府库殫虚,靡积仓箱。陵迟衰微,周卒以亡。秦收太半,二世不瘳。泣血之求,海内无聊。农臣司均,敢告执繇。^{[2](P354)}

“时维”、“厥初”,出自《诗·大雅·生民》;“自京徂荒”,化用《诗·大雅·桑柔》“自西徂东”句式;“粒民”、“厥僚后稷”、“有无迁易”等,化自《尚书·尧典》“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之语;“实均实赢”,化用《生民》“实发实秀”句式等;“什一而征”,见《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什一,藉而不税。”“东作”,出自《尚书·尧典》“平秩东作”;“靡积仓箱”,出自《诗·小雅·甫田》:“乃求千斯箱,乃求万斯仓。”“陵迟衰微”,出自《史记·平准书》:“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陵迟衰微。”“泣血”,出自《礼记·檀弓上》:“高子皋之执亲之丧也,泣血三年。”他箴类此。其后期所作《剧秦美新》^①也是如此,故班固讥其“典而亡实”(《文选·典引序》),与此前的枚、马之作差异较大。

枚乘、司马相如的赋,虽然情感未必得见,却有气势在焉。《七发》气势充沛,造语丰富,历史、神话、传说、社会生活事项交错出现;比喻、夸张、想象等手法交互运用,如抽丝剥茧,变化无穷,奇特生动。如果说历史、神话、传说等是学,那么比喻、夸张等则为才,枚乘是以才运学,属于才子型文人。对此,前人多有评论。如刘勰说“枚乘摘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王世贞评《七发》“辞气跌宕,怪丽不恒”(《艺苑卮言》卷三)。也正因为如此,《七发》结尾陈咨略者部分,对于很难表达出文学趣味的诸子“要言妙道”,枚乘提而不论,也因此招致“见焉而未莹,语焉而莫详悉,未免识者所哂”^{[3](卷29学记)}之讥。枚乘文如其赋,其《上书谏吴王》只以利害为言,“长喻远譬,曲尽厉害”^{[4](卷47读史二·邹阳枚乘)},语与理谐,表现在文字上,便是并不引经据典、以学问为意。理学家因此谓“吴王怨望,阴有邪谋。邹阳、枚乘之徒,不能明义以导其君,而区区以利说之,宜乎其无益也。及吴兵西向,而枚乘犹以民之轻重、国之大小为言,则是以吴重大而汉轻小,则吴兵可得而进也。吴亡,乘不及祸,而卒以取重于世,兴矣夫”^{[5](卷9邹阳枚乘)}。虽是理学立场,也是切中事情之语。

司马相如《子虚赋》中,宾主双方竞夸物欲对象,自始至终没有推出精神层面的需求,遑论儒家经典

① 陆侃如系此文于王莽始建国元年(9)(参见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41页);刘跃进系此文于始建国五年(13)(参见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16页)。

的影子,《上林赋》也只是在曲终奏雅部分提到过《诗》中的寥寥数个名物,所谓“游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途,览观《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驹虞》”。其主体部分全凭赋家“控引天地,错综古今”的无所顾忌的奇妙构思、“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胸襟与气概,^①其特色则是“繁类以成艳”(《文心雕龙·诠赋》)、“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文心雕龙·物色》)。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司马相如为信使谕告巴蜀,作《谕巴蜀檄》,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相如作《难蜀父老文》,二文亦以“喻博”(《文心雕龙·移檄》)见长。司马相如的《封禅书》是其临终所作,^②其中引《书》1处,《诗》语2处,提及《春秋》之名1处,故班固《典引序》讥其“靡而不典”。

但刘勰的上述言论并不适用于扬雄的全部作品。扬雄作品以其入京成为待诏作为分界,分为早、中、后三个时期。早期与中期作品与司马相如类似,引物连类,能究情状,靡而不典,《蜀都赋》与《甘泉》《羽猎》《河东》《长杨》四赋是其例。至如《官箴》《州箴》《剧秦美新》,则为后期代表作,^③风格典雅,如刘勰所说“引书以助文”。而扬雄的后期作品及其出处选择对东汉文人构成较大影响。

二、蜀地文化氛围与扬雄早期创作

虽然历代赋论者努力牵合赋与经学,消弭两者之间的矛盾,如“赋者,古诗之流”(班固《两都赋序》)的论断,但赋之“极声貌以穷文”(《文心雕龙·诠赋》)、“不免于劝”(扬雄《法言·吾子》)的文类特质与经学强调恭俭庄敬有度的规训之间毕竟有难以逾越的界限。以经学为尚的文化氛围必然导致赋的变体与创作的压抑,相反,一个不受经学干扰的文化氛围,必然能够催生逞才以适“淫丽”的赋家。扬雄的经历与创作是这一论断的微缩样本。扬雄的早、中、后三期作品分别作于蜀地(早期)与京师(中期与后期),西汉地方与朝廷文化氛围的差异,导致扬雄不同时期的创作思想与题材、体裁均发生变化。

蒙文通先生指出“辞赋、黄老和卜筮、历数这才是巴蜀古文化的特点”,^{[6][P44]}“辞赋、黄老、天文,可以说司马相如、严君平、落下闳是这些文化的杰出代表。他们和秦的迁人、和汉五经博士的学术是无丝毫关系的”,^{[6][P47]}“在从思想系统上,环境关系上,只能说是接近于楚”。^{[6][P44]}这里我们着重申明的是:对于经学的疏离,也是西汉时期巴蜀地域文化的特点,这也影响了西汉时期蜀地作家部分作品风貌的形成。

谈到汉代的巴蜀文化,文翁是人们首先标举的人物。《汉书·循吏传》载,“少好学,通《春秋》”的文翁,“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厉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文翁对于巴蜀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这里需要分疏的是:第一,文翁在景帝末年任蜀太守,此时朝廷并不推尊儒学,虽然设有博士官,但并不专主于儒,主刑名法律的晁错为博士是其例,所以文翁的教化及其所派出的学员所受教育并不以儒学为主。第二,文翁的教化没有激起蜀民的道德信仰,但是令蜀人开阔了眼界,提供了彰显个性价值、追求利益的多方途径。《汉书·地理志》以互见法的方式对此作出记载:“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至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汉书·地理志》),更令蜀民看到逞才作文的前景,于是,“乡党慕循其迹”(同上)。这种情形,到东汉章帝时也没有太大改变。《后汉书·廉范传》载,建初(76-83)中,廉范任蜀郡

① 按《西京杂记》卷二载相如与盛览论赋之事:“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字长通。牂牁名士。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事情大约是虚拟,“苞括宇宙,总览人物”云云,也未必是相如的原话,但却合乎其作品的风貌,应该说是准确把握到了相如的作赋心态与思维特点。

② 一般以为作于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参见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第167-168页)。

③ 扬雄作《州箴》、《官箴》,陆侃如系在孺子婴初始元年(8)(《中古文学系年》,第37-40页)。

太守,此时蜀地风俗并非经学所标尚的淳厚,而是“尚文辞,好相持短长”。至于蜀汉秦宓“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蜀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故《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三国志·蜀志·秦宓传》),显然是出于某种目的而对《汉书·地理志》作出的误读。

正是在以赋扬名的前景中,蜀人看到希望,遂有王褒、扬雄等赋家先后成名。司马相如疏离于经典的赋作对于蜀地才子文人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王褒《僮约》作于蜀地,^①文字诙谐,不以礼法、书典为意,或许就是回蜀之后被蜀地创作风气感染的缘故。

早期居蜀的扬雄,对于屈原、司马相如浪漫飞动的文辞非常爱慕。其自序说“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以为式。”(《汉书·扬雄传》)这种模拟,早在其能文的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开始,其《答刘歆书》说“雄始能草文,先作《县邸铭》《王卬颂》《阶闼铭》及《成都城四隅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诵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见。”据《文选》李周翰注说还有《绵竹颂》等辞赋,当然也包括《蜀都赋》。^②这类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逞才之作,以《蜀都赋》为代表;一类是抒情之作,以《反离骚》为代表。无论是哪一类作品,都呈现出才子气。

虽然《蜀都赋》的壮丽飞动较之后来的《甘泉》四赋略为逊色,但言及蜀地的山水与物产时也是搜奇掘诡,极尽夸张之能事,如其言蜀地川流之盛则曰“旋溺冤,纓颓慚。博岸敌呬,粹瀨磴岩。槿纷纷,忽溶閼沛,逾窘出限,连混阨隧,铨钉钟涌,声欢薄萍龙,历丰隆,潜潜延延,雷扶电击。鸿康濫,速远乎长喻,驰山下卒,湍降疾流,分川并注,合乎江州。”旋、纓、磴、逾、扶、击、驰等诸多具有强烈动感的词语,分置于三、四言短句中,写尽水的迅疾之感。写蜀锦之轻薄则曰“其布则细都弱折,绵茧成衽;阿丽纤靡,避晏与阴。蜘蛛作丝,不可见风。箒中黄润,一端数金。”比喻奇特,对家乡的热爱之情洋溢其中。

《文选·甘泉赋》李周翰注“扬雄家贫好学,每制作慕相如之文,尝作《绵竹颂》。成帝时直宿郎杨庄诵此文,帝曰‘此似相如之文。’庄曰‘非也,此臣邑人扬子云。’帝即召见,拜为黄门侍郎。”这段文字与上引《答刘歆书》所载除赋名和篇数上略有分歧外他处大同,都指出扬雄早期作品几与相如相混,足见其作品的才子气。《蜀都赋》亦不以儒家思想为旨归,造语亦不以书典为意。班固联系扬雄自序所列诸作总结扬雄一生时说他“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后世”(《汉书·扬雄传赞》),所谓“乐道”,显然并不能概括蜀地时的扬雄,扬雄晚年作《自序》不及《蜀都赋》等,显然以其无“乐道”之言,只是满足了逞才炫博的自娱、娱人功能。更深入地推求,此时扬雄的辞赋创作并不受儒家之“道”的支配。

就其自序来看,对于屈原,扬雄早年感慨他“文过相如而至不容”,故“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但扬雄对于屈原的自沉颇不以为然,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出于爱慕与沉痛惋惜之情,扬雄作《反离骚》,自岷山投于江中,以祭屈原;复依《离骚》,引申其意,作《广骚》;又傍屈原《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作《畔牢愁》。支配他反复写作的是不可遏制的悼念痛惜之情,“盖深悼三闾之沦没,非爱原极切,不至有斯文”。^{[7][P241]}《反离骚》云“惟天轨之不辟兮,何纯洁而离纷。”“图累承彼洪波兮,又览累之昌辞。”扬雄敬佩屈原“纯洁”的人格与“昌辞”之才,伤痛其“离纷”的不幸遭遇,叹息其自沉汨罗的结局,这种强烈的情感支配他创作出《反离骚》等一系列别具一格的凭吊屈原的作品,属于纯粹个性化的心灵抒写。《反离骚》结尾出现孔子、老子、许由等历史人物,并非作者向学术靠拢的表现,而是为表达自己的惋惜之情而托出的历史依据。

辞赋相对于诗,是逞才炫学的文学样式,它放任并刺激作家的想象,以铺陈名物、反复陈情见长。就汉代大赋的体制而言,它需要才华与学识俱备,所谓“赋兼才学”(刘熙载《艺概·赋概》)、“铺采摘文,体物写志”(《文心雕龙·诠赋》)是汉赋的艺术本质,舍此则不为汉赋。这要求赋家兼收并蓄,为思维的纵横驰骋、语言的铺排夸饰提供材料。如果说赋家的想象能力是能够抟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那么赋家日常积累的名词语词则是托起大鹏的云气和风。这种文类特点决定了赋家自身有向博学一路趋近的

① 石观海以为,王褒于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始经王褒举荐,得宣帝征见;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正月,王褒因事返郡,作《僮约》;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作《甘泉颂》《洞箫颂》;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作《碧鸡颂》,道病卒(参阅石观海《前汉文人终军、王褒行年新考》,《长江学术》2006年第3期)。

② 《蜀都赋》为扬雄早年作品(参阅吴明贤《扬雄、左思〈蜀都赋〉比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可能性。扬雄早期从林间翁孺等受学奇字,^①很难说没有服务于其逞才炫博的辞赋创作目的。

三、朝廷士大夫的文化使命感与入石室观书

初入京师的扬雄,显然是希望以自己的辞赋才华引起成帝的注意。事实也按照他的意愿演进,其自序谓“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汉书·扬雄传》)结合前引其《答刘歆书》来看,此“客”即杨庄。杨庄诵扬雄之文于成帝不是偶然的现象,因为杨庄手中所持有的扬雄诸文,在印刷术未行、文字载体笨重的时代不是可以轻易得到,必是扬雄入京后授之,并请其代为传递。

扬雄得以待诏承明,不久任为侍郎,成为朝廷士大夫中的一员,身份与前此居蜀时期有所不同。朝廷上下弥漫的经学话语,自然滋生了扬雄以道辅君的使命感。其《甘泉》四赋便隐含了对于成帝的规劝。其自序言四赋俱是有为而作:成帝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郊祠甘泉以求继嗣,扬雄“从上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同年三月,成帝祭汾阴后土之后,“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眇然以思唐虞之风”,扬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还,上《河东赋》以劝;同年十二月成帝羽猎,扬雄又“聊因校猎,赋以风”;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成帝“大夸胡人以多禽兽”,扬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当然,这种规劝意图隐藏在“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为,鬼神力乃成”(《论衡·谴告》)的夸饰背后,与司马相如《大人赋》之“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的意图与手法相同,以致效果也是惊人的相似,如武帝“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成帝也是“不觉,为之不已”(《论衡·谴告》)。这并非扬雄的阿谀,而是赋的夸丽风骇的本质与士大夫政治使命的矛盾使然。扬雄很快便注意到这一点,其自序谈到了他此时的心路历程:“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阔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汉书·扬雄传》)扬雄创作上的第二个时期也以《长杨赋》创作的结束而宣告终止。

当司马相如看到辞赋的骇丽与经学的讽谏背道而驰时,他选择了对政治与经术的疏离从而在客观上坚持了文学的本位立场,《汉书·司马相如传》言其“常有消渴病。与卓氏婚,饶于财。故其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常称疾闲居,不慕官爵”,所以其临终之作《封禅文》才依然“靡而不典”。在这一点上,扬雄与他同乡的先贤颇不相同,当他注意到赋与士大夫使命的矛盾的同时,扬雄找到了另外一条出路:从事学术著述。这并非扬雄的独创,而是朝廷文化潮流使然,前面的司马迁、刘向,都给扬雄做了很好的引领。

文人嗜书,自古而然。博览群书,更是进行学术撰述的前提。但书籍的获得,却并非易事,汉代尤然。秦火之后,书籍散佚严重。虽然从汉惠帝开始,官方就已废除挟书之律,但因为书写条件等限制,民间书籍流通并不广泛。朝廷虽然有整理图书的举措,但显然不是出于文化传播的需要。早自汉初统治者就开始“大收篇籍”,^{[8][P1701]}并着手建立自己的藏书制度,修建石渠、天禄、麒麟等藏书楼,此后,随着藏书渐多,藏书之所也多所增置,“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8][P1702]}杜佑《通典·职官八》记载较为完备:“汉氏图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阁、广内,贮之于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兰台秘书及麒麟、天禄二阁,藏之于内禁。”这些藏于禁中的书籍,中间或有散佚,但也递有增补、整理,武帝、成帝是对于图书文献整理比较重视的两位帝王,成帝对于整理图书的贡献尤大。《汉书·艺文志》:“迄孝武之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这些中秘书籍,只有个别

^① 扬雄《答刘歆书》言“尝闻先代轺轩之使,奏籍之书,皆藏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遗弃不见之者。独蜀人严君平、临邛林间翁孺者,深好训诂,犹见轺轩之使所奏书。翁孺与雄外家牵连之亲,又君平过误有以私遇,少而与雄也。”

人凭借职务之便可以见到,一般人显然与之无缘。

司马迁之能成一家之言,正在于他能够凭借太史令“典掌书记”(桓谭《新论·求辅》)的职务方便,“絀石室金匱之书”,使“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史记·太史公自序》)。西汉后期,虽然市场上有书籍流通,官方学校、私人精舍也有人教授,但受载体笨重的限制,文字量有限。史记百家之说,更以其不合经术,朝廷限制其传播,一般文人难以见到。《汉书·宣元六王传》的记载很能说明问题:成帝初年,东平王刘宇来朝,以叔父之尊上书求诸子书与《太史公书》,权臣王凤劝成帝拒绝,理由是“《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并建议作如下回复:“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王审乐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讲诵,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辩破义,小道不通,致远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诸益于经术者,不爱于王。”而班氏家族因为是外戚的缘故,才“家有赐书”(《汉书·叙传》)。由此可知,出于维护中央集权的考虑,很多书籍并不对外传播;另一方面,很多人也表现出对此类书籍的兴趣。扬雄是其中之一,“乏无担石之储”的扬雄入京后,便广泛寻找阅读机会,班氏的藏书吸引扬雄“造其门”,宫廷藏书,自然更受到扬雄的注意,入石室观书成为扬雄的迫切愿望。

如果说前此刘向著述的成功最初是得益于成帝校中秘书的愿望,是被动应承的产物,那么,扬雄入石室观书的请求,无疑具有主动性。扬雄入石室的最初出发点,似乎只是希望做个更称职的专业文人,其《答刘歆书》:“雄为郎之岁,自奏少不得学,而心好沈博绝丽之文。愿不受三岁之奉,且休脱直事之徭,得肆心广义以自克就。”沈博绝丽,指既有思想内容,又文采焕然的文章。这投合成帝了对于艺文的兴趣,于是“有诏可不夺奉,令尚书赐笔墨钱六万,得观书于石室”。扬雄如愿以偿,成了一个由皇家供养的文人。不久,就写成《绣补》《灵节》《龙骨》之铭及诗三章,受到成帝的称赞,但从实际成效看,这显然不是扬雄观书的主要目的。

由《汉书》本传及《法言》可知,扬雄在石室至少阅读了《庄子》《淮南子》等诸子书、《左传》《史记》等史书。这类著作的阅读,使扬雄极大开阔了眼界,早年的感性认识得到深化,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石室阅读在他后期的著述中留下的印记比比皆是。其《法言》即是通过对于诸子的批判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如《法言·君子》说:“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淮南》鲜取焉尔。”

在石室观书的扬雄逐步确立了以学术著述垂名后世的想法,并且开始了各种学术实践,这些学术实践,显然受时代经学空气的影响,如其以孔孟继承人自居,以传“道”自任,但扬雄又与一般经师著述的就经文而“分文析字,烦言碎辞”不同,而是度越五经,自成体系。据其自序,大约于哀帝建平三(公元前4年)、四年(公元前3年)时起,扬雄开始草拟《太玄》,表达自己对于天道、人事、五行、五常的系统认识;^①又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氏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或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因应时人之问,仿《论语》作《法言》,此事陆侃如系在平帝元始二年(2)扬雄55岁时,刘跃进系在平帝元始三年(3)。^②其《答刘歆书》约作于王莽天凤二(15)、三年(16),时由其“怀铅提槧,从诸计吏,访殊方绝域四方之语”整理而成的《方言》正在撰著中。^③在汉代,史学是以《春秋》学的分支出现的,司马迁如是看待,其《太史公自序》虽然对于壶遂将《史记》“比之于《春秋》”表示不敢当,但这显然是谦辞,从《自序》对于《春秋》的反复提及来看,正说明《史记》是“继《春秋》”的创作。扬雄对于叙汉史也如是观,著作《史记》也是扬雄入石室后的主要学术活动之一。《后汉书·班彪传》:“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李贤注:“好事者谓扬雄、刘歆、阳城衡、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论衡·须颂》:“司马子长记黄帝以至孝武,扬子云录宣帝以致哀平。”姚振宗谓“《论衡》言扬子云录宣帝至哀平,《史通》亦谓其精勤不懈,则子云所续者特多”。^{[9][P24]}班

① 陆侃如系在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刘跃进系在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参见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第20页;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第299-300页)。

② 参见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第26页;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第307-308页。

③ 陆侃如系在天凤三年(16),参见《中古文学系年》,第44页;刘跃进系在天凤二年(15),参见《秦汉文学编年史》,第316-317页。

固说他的《汉书》乃是“探纂前记 缀辑旧闻”(《汉书·叙传》)而成,这里面提到的“前记”,应该包括扬雄的续《史记》。^①从后世流传情况看,扬雄关于西汉的史学著述显然被班固《汉书》取代。他如《琴清英》《训纂》《州箴》《官箴》等也都是后期的作品。对于后人而言,扬雄作为学者型文人的真正确立的标志是其对方言的搜集整理而成的《方言》、仿《论语》而作的《法言》、仿《周易》而成的《太玄》。这些著述,早在扬雄在世的时候,就相继受到关注,经过东汉时期的发酵,并最终酿成魏晋时期研究的热潮。

需要说明的是,早年的感性表达,在石室观书之后,也获得了理性的书写。比如对于屈原的观照,扬雄年轻时主要肯定他“文过相如”(《汉书》本传)的一面,理想高卓和人格清白倒在其次,中年以后,逐渐转向对其人格的肯定,但自始至终否定他的方法和结局。对于屈原的叹惋,早年以《反离骚》《广骚》《畔牢愁》等文学创作的形式表达,晚年则以汉代经学所推重的“智”范畴作为批评准绳予以评价,由感性的叹惋转为理性的反思,表现出向学术的归趋。但作为学者的扬雄,显然不是心情平静并就此放弃了对于个体心灵的个性化书写。《解嘲》《解难》《太玄赋》《逐贫赋》^②等表现了平静外表下的心灵动荡。

四、扬雄入石室观书与作为学者型文人的垂范意义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说扬雄“仕京师显名”,然则扬雄在他的时代贫则贫矣,寂寞则未必然,在世时即有刘歆、范滂、桓谭敬之,贵为国师的刘歆也令其子刘棻向扬雄“学作奇字”,好事者侯芭等人向其问学(《汉书·扬雄传》),他去世的时候,“诸公遣世子、朝臣、郎吏行事者会送。桓君山为敛赙,起祠堂。侯芭负土作坟,号曰玄冢”。^{[10] P731}后世文人更是以之为楷模,取其路径。东汉文人学者对于兰台、东观的向往当与扬雄的引领与刺激有关。

历来人们都从制度层面来关注东观、兰台的文学意义,或从题材、体裁方面谈东观、兰台对于东汉文学的影响,^③而对于时代风气的关注则较少,扬雄的引领意义也因而未能彰显。

东汉文人尚“博”、“通”。王充每每以“通人”、“通儒”称美当世文人。《后汉书》述东汉文人也往往称道其“博学”、“通才”,如称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训诂大义,不为章句”(《后汉书》本传),冯衍“至二十而博通群书”(《后汉书》本传),杜笃“少博学”(《后汉书·文苑传》),梁鸿“博览无不通”(《后汉书·逸民传》),傅毅“少博学”(《后汉书·文苑传》),崔骃“年十三能通《诗》、《易》、《春秋》,博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后汉书》本传),王充“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本传),班固“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后汉书·班彪传》),班昭“博学高才”(《后汉书·列女传》),黄香“博通经典,究精道术”(《后汉书·文苑传》),张衡“通五经,贯六艺”(《后汉书》本传),马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后汉书》本传),崔琦“以文章博通称”(《后汉书·文苑传》)。这显然是对东汉风气的记载。因为东汉人称道时贤,即每每以此为誉,如蔡邕《太尉胡广碑》称道胡广即曰“凡圣哲之遗教,文武之未坠,罔有不综。”(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七六)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称道张衡“焉所不学,亦何不师。”(《全后汉文》卷四五)扬雄正是此中的先贤、典范。扬雄博极群书,东汉人多推重之,以为楷模。桓谭《新论·闵友》说他“才智开通,能入圣道,卓绝于众。汉兴以来,未有此人也”,“通才著书以百数,惟太史公广大,其余皆丛残小论,不能比之子云所造《法言》《太玄经》也。《玄》经数百年,其书必传。”王充《论衡·案书》:“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当今未显,使在百世之后,则子政、子云之党也”。班固《汉书·楚元王传》:“自孔子之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传曰‘圣人不出,其间必有命世者焉’,岂近是乎?”又《答宾戏》:“近者陆子优游,《新语》以兴;董生下帷,发藻儒林;刘向司籍,辩章旧闻;扬雄覃思,《法言》《太玄》;皆及时君之门闾,究先王之壺奥,婆娑乎术艺之场,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质而发其文,用纳乎圣听,列炳于后人,

① 扬雄续《史记》,陆侃如系在孺子婴居摄元年(6)(参见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第34页)。

② 陆侃如将扬雄《解嘲》《解难》《太玄赋》作年均系于汉哀帝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扬雄50岁时,《逐贫赋》“当作于暮年穷愁之际”,故将其作年系于王莽始建国四年(12)扬雄65岁时(参见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第20-22页、43页)。

③ 参阅刘跃进《东观著作的学术活动及其文学影响研究》(《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陈君《论兰台文人及其文学活动》(《文学遗产》2008年第4期)。

斯非其亚与。”

扬雄入石室观书与天禄阁校书而成就学问的经历给东汉文人以很好的示范。王充《论衡·书解》的如下一段话应该是代表了时人的观点“使著作之时,总众事之凡,典国境之职,汲汲忙忙,何暇著作……孔子作《春秋》,不用于周也。司马长卿不预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虚》之赋。扬子云存中郎之官,故能成《太玄经》,就《法言》。”“夫有长于彼,安能不短于此?深于作文,安能不浅于政治?”王充身体力行,实践了这种认识,其著《论衡》时“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后汉书·王充传》)。扬雄的退守天禄阁在东汉文人视野中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东汉宫廷藏书室有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云台等,藏书丰富,这使东汉文人追慕扬雄有了可以落实的前提。如《后汉书·儒林传序》云“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中秘藏书的数量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学者们是有目共睹的。《后汉书·窦章传》:“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臧室,道家蓬莱山,康遂荐章入东观为校书郎。”李贤注“老子为守臧吏,复为柱下史,四方所记文书皆归柱下。事见《史记》。言东观经籍多也。蓬莱,海中神山,为仙府,幽经秘录并皆在焉。”

当然东汉文人对于图书的雅好的满足,也与帝王推重经史的文化政策紧密相关。《隋书·经籍志》:“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钜儒,负裘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帝王对文人的需求与文人博览的兴趣一拍即合,双方均获得所需与满足。《后汉书·文苑传》的记载就是很生动的说明“元和元年,肃宗诏香诣东观,读所未见书。”简短的文字背后,是文人对东观丰富藏书的向往。

东汉文人,多有校书兰台、著作东观的经历。据《后汉书》《华阳国志》等史籍记载,班固、傅毅、杨终、黄香、刘騊駼、刘珍、边韶、高彪、李尤、李胜、朱穆、崔寔、曹寿、延笃、王逸、崔骃、蔡邕等知名文人曾校书兰台、著作东观,这些文人也由此获得“通人”称号,与时代的博雅之风相得益彰。《论衡·别通》:“或曰:通人之官,兰台令史,职校书定字,比夫太史、太祝,职在文书,无典民之用,不可施設。是以兰台之史,班固、贾逵、杨终、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积不继,大用于世。曰:……然则兰台之官,国所监得失也。以心如丸卵,为体内藏,眸子如豆,为身光明,令史虽微,典国道藏,通人所由进,犹博士之官,儒生所由兴也。”这些人除了文学创作,也多有学术著作问世。除刘珍等人秉承圣意共同编纂的《东观汉记》外,尚有班固著《汉书》,马融遍注《周易》《尚书》《三礼》《论语》《孝经》《老子》《淮南子》《列女传》《离骚》等,王逸撰《楚辞章句》,蔡邕作《独断》,崔寔作《政论》《四民月令》等,他们的私人著述,得益于兰台、东观的阅读,而扬雄无疑起到“导夫先路”的作用。

扬雄后期“典美”文风对于东汉文人同样具有引领意义。扬雄《州箴》《官箴》,“引书以助文”,文风典雅。对此,东汉文人极尽模仿,如崔琦、崔骃、崔瑗、胡广、高彪、潘勖等人。对此,史家有清晰的认识。《后汉书·胡广传》云“初,扬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阙。后涿郡崔骃及子瑗,又临邑侯刘騊駼增补十六篇(胡)广复继作四篇,文甚典美。”赋家们则进一步运用自己在兰台、石室中所得的关于经史百家的学问,变成了赋的材料,通过奥博以出新,文章呈现为典雅的风格。

参考文献:

- [1]刘克庄.刘后村题跋[A].张均衡.适园丛书:第三辑[C].民国二年(1913)乌程张氏刻本.
- [2]张震泽.扬雄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3]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藁续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黄震.黄氏日钞[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5]杨时.龟山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6]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J].四川大学学报,1959(5).
- [7]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 [8]班固.汉书·艺文志[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
- [9]二十五史补编·汉书艺文志拾补[M].北京:开明书店,1936.
- [10]欧阳询.艺文类聚[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张立荣)